

# 文革時期「極左思潮」個案： 上海「反復辟學會」(上)

• 董國強、樊建政

**摘要：**迄今為止，幾乎所有關於文化大革命時期激進社會思潮(或曰「極『左』思潮」、「異端思潮」、「新思潮」等)的論著都採用「社會衝突理論」的分析框架，強調這些激進社會思潮與文革主流意識形態的二元對立關係。本文通過深入解剖上海「反復辟學會」成員的社會構成、成長經歷、政治參與活動以及他們撰寫的各類文章，對上述看法提出質疑和挑戰。本文指出，上述看法或多或少受到文革期間主流意識形態話語的影響，而這些話語不過是特定歷史條件下的政治權宜之計，與歷史事實相去甚遠；然後依據大量事實對「反復辟學會」作出新的定性，並用「政治模糊性」理論解釋了這個典型的毛主義小團體緣何在文革中兩起兩落，最終淪為政治犧牲品。本文認為對一些約定俗成的歷史概念作出恰如其分的重新界定與重新歸類，不僅可以避免許多不必要的學術紛爭，而且可以拓展與深化我們對文革期間政治衝突起源和性質的認知。

**關鍵詞：**「反復辟學會」 極左思潮 異端思潮 新思潮 文化大革命

編者按：由於篇幅關係，本刊將分兩期刊出文章，本期先刊出第一至四節。

## 一 前言

1967年春夏，伴隨着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群眾運動，各地先後出現了一些激進小組織，如北京「四三派」、湖南「省無聯」、武漢「北決揚」、上海「反復辟學會」、上海「中串會」、廣西「今日的哥達綱領」派、山東「渤海戰團」等。

\* 在本文寫作和修改過程中，陳秀惠先生、李元茂先生、徐志新先生、王海光教授、韓鋼教授、楊奎松教授、馮筱才教授、印紅標教授、吳一慶教授、吳銘教授、浦興祖教授、蕭功秦教授、王奇生教授、陳益南先生、孫怒濤先生、兩位匿名評審專家及《二十一世紀》編輯部諸位同仁貢獻了非常寶貴的修改意見，兩位作者特此鳴謝！

一些學者已對這類小組組織及其思潮做過論述，例如：王紹光曾深入剖析武漢「北決揚」個案，認為以「北決揚」為代表的「新思潮」的倡導者和擁護者，大多出身不好、年輕、不掌權，之所以捲入造反運動，是因為對文革前的社會秩序不滿。他們不是主張對現有官僚政治體制做些局部性的調整，而是要創造一種沒有官僚政治、沒有經濟剝削、真正人人平等的新生活，這種自發傾向對中央權威構成威脅，所以迅速遭到鎮壓<sup>①</sup>。宋永毅等人將這些社會思潮定義為「異端思潮」，認為這些社會思潮是文革的副衍物和對立物，是對毛澤東在發動文革時做出的帶有民主色彩的許諾的邏輯推理與發展。這些社會思潮及其倡導者之所以遭到殘酷鎮壓，是因為他們在運動過程中要求當局兌現其承諾<sup>②</sup>。徐友漁在相關論著中也沿用了「異端思潮」概念，但對其內涵做出進一步細分。他認為「異端思潮」既可能表現為對所謂「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的疏離與反叛，也可能表現為對這個理論的自行解釋。這種解釋的動機也許是要讓毛澤東的文革理論更為徹底和自治，但它客觀上挑戰了1949年以來基本制度的合理性，而且違背了毛發動文革的直接目標和具體部署<sup>③</sup>。印紅標將類似於「北決揚」的社會思潮定義為「極左『新思潮』」。他認為這些「極左『新思潮』」之所以遭到鎮壓，是因為有的是在文革基本理論和社會政治分析方面超越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央的理論觀點，也有的是在運動的具體步驟方面偏離中央意圖<sup>④</sup>。

上述幾位論者的著述無疑具有開創之功，包含重要洞見。本文兩位筆者對文革時期社會思潮的了解與認知大多奠基於這些早期研究論著。然而，在我們接觸到上海「反復辟學會」大量且系統的原始材料<sup>⑤</sup>，並對該學會核心人物陳秀惠和受「反復辟學會」專案牽連的徐志新、李元茂<sup>⑥</sup>等人持續數年的深入訪談之後，我們對所謂「極左思潮」（或曰「新思潮」、「極左『新思潮』」、「異端思潮」等）概念有了一些新的認知：

第一，通過對這些概念的語源學追溯，我們發現這些概念並非上述幾位論者的理論原創，而是源於文革期間的流行話語。據筆者目前所知，文革「新思潮」一詞始見於1967年6月11日北京群眾組織報刊《四三戰報》上發表的文章〈論新思潮——四三派宣言〉<sup>⑦</sup>，而「極『左』思潮」、「反動思潮」等概念，則首先出現在同年中央領導人講話和官方內部文件中<sup>⑧</sup>；當時特地給「左」字加上引號，是為了強調這些社會思潮「形左實右」。

第二，無論當年的流行話語（尤其是官方流行話語）使用哪種概念，都旨在強調這些社會思潮與當時主流意識形態的二元對立關係。這樣的概念界定固然具有一定的歷史依據和邏輯自治，但同時存在以偏概全的傾向。例如上海「反復辟學會」及其言論在1968年春被當局定性為「反革命組織」和「反動思潮」<sup>⑨</sup>，但他們主觀上並無「超越」和「偏離」毛主義的企圖，客觀上也不具備獨立思考和批判性地揭露問題的能力。基於我們對上海「反復辟學會」個案的深入研究，結合上述各論者的專題論述，我們推測文革期間官方認定的所謂「極『左』思潮」可能分為兩種類型：一種是當時社會利益衝突的真實反映，本質上是一些現行體制下的受壓群體或邊緣群體為了自身特定的利益訴求，「打着紅旗反紅旗」；另一種則是當時正統觀念的衍生物，本質上是一些狂熱的毛主義信徒為了彰顯自己的激進革命姿態，將文革初期官方輿論宣傳的一些看

法和論斷推向極致，當最高當局認為有必要終結群眾運動時，他們作為替罪羊被指控為所謂「極『左』思潮」。

第三，上述幾位論者（以及持類似看法的楊曦光、劉國凱等人<sup>⑩</sup>）都是文革親歷者，有些人（如宋永毅、楊曦光、劉國凱）還曾直接被捲入各地激進小集團的活動。文革結束後，他們都經歷了1980年代新啟蒙運動的洗禮，並有機會親身體驗西方現代文明，在思想觀念上有了很大的躍升。基於上述事實，我們對上述幾位學者的概念運用心存疑慮：他們在論述文革時期激進小組織及其思潮時，會否將自己的個人親身經歷以及文革後逐步形成的社會理想、政治態度、思想意識投射到相關的某些論述對象身上，因而形成對歷史的某種誤讀？或者，他們會否因為某些激進小集團及其思潮曾經遭到當局無情打壓，對它們充滿道義上的同情，因而拔高了其思想主張的積極含義？或者，他們會否因為某些激進小集團成員誇大其詞的自我標榜，以及專案組無限上綱的指控，而產生認知的偏差？

毋庸諱言，由於缺乏相關個案的系統而詳實的歷史資料，主要是囿於資料的不易獲取<sup>⑪</sup>，現有論著在論及激進思潮時不得不主要採用「宏大敘事」的論述框架。這樣的歷史著述對於我們從整體上把握文革期間社會思潮的階段性發展趨勢不無助益，但是落實到一個個具體個案，依然帶有簡單化和概念化的形似詞條註釋的性質，其立論依據主要是對若干代表性論著（如湖南「省無聯」的〈中國向何處去〉，武漢「北決揚」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與叛徒考茨基〉、〈怎樣認識無產階級政治革命〉，上海「中串會」的〈一切為了九大〉、〈給春橋同志的一封信〉，上海「反復辟學會」的〈「反復辟學會」創立宣言（草案）〉等）的文本分析<sup>⑫</sup>。思想史研究當然離不開文本分析，然而如果我們對文本作者的具體背景、文本產生的特定背景，以及中長時段社會思想狀態缺乏了解，就很難區分文本中哪些內容和表述反映作者的真實想法和利益訴求（基於作者的獨立認知與判斷），哪些是特定語境下的話語策略（對官方意識形態的無條件接納與自我內化）。另一方面，由於一些現有論著在整體認知上受到「社會衝突理論」的影響，論述存在概念化的傾向，因此往往忽略了現有史料中一些看似細微但至關重要的歷史事實<sup>⑬</sup>。由此可見，要在現有基礎上拓展與深化我們對激進思潮相關問題的認知，就必須對一個個相關個案進行更加系統、深入、扎實的實證研究。

本文依然屬於廣義的思想史研究的範疇，不過與一般思想史論著的撰述方式不同，除了對「反復辟學會」成員的論著進行必要的文本引證外，還試圖盡可能全面客觀地呈現該學會成員的社會構成、成長經歷和參與的文革政治活動。在我們看來，當下常見的思想史撰述方式很容易從單純的文本分析走向抽象的理論思辨，因而其觀點和結論往往帶有較強的主觀性。要確切地了解歷史人物的真實思想狀況，我們不但要聽其言，而且要觀其行。因為在特定的歷史語境下，行為方式往往能夠更好地反映人們的真實思想傾向。所以，本文的研究初衷並不僅限於給「反復辟學會」及其思想傾向作出定性，而且要客觀地呈現其真實思想狀況以及促成這種思想形成的社會歷史環境。正是基於這樣的整體認知，我們認為現有論著對文革時期激進思潮的籠統定性值得商榷。

## 二 「陳秀惠們」：「新社會」的受益者和毛主義信徒

上海「反復辟學會」，由「反復辟戰鬥小組」發展而來，1967年8月成立，是一個以復旦大學國際政治系學生為主體、組織形態鬆散的文革極左派小組組織<sup>⑭</sup>，其十名成員的簡單情況如下(表1)：

表1 「反復辟學會」成員簡要情況統計表

姓名	所在單位	職業	家庭出身	政治面貌	受教育程度	處理結論
陳秀惠	復旦國際政治系	學生	工人	團員	大學	現行反革命
俞××	復旦國際政治系	學生	職員	團員	大學	嚴重政治錯誤
崔××	復旦國際政治系	學生	下中農	預備黨員	大學	嚴重政治錯誤
夏××	復旦國際政治系	學生	貧農	預備黨員	大學	嚴重政治錯誤
黃××	復旦國際政治系	學生	貧農	團員	大學	嚴重政治錯誤
李××	復旦經濟系	學生	工人	團員	大學	一般政治錯誤
孫××	上海大陸飯店	工人	不詳	基本群眾	不詳	嚴重政治錯誤
孟××	上海江南造船廠	工人	工人	團員	不詳	嚴重政治錯誤
衛××	上海金陵西路食堂	工人	不詳	團員	小學	現行反革命， 接受審查期間 畏罪自殺
史行八	上海四方鍋爐廠	工人	貧農	基本群眾	不詳	現行反革命， 判刑

資料來源：陳秀惠：〈「學員」——「學會」回憶材料之三〉，手稿(1977年1月10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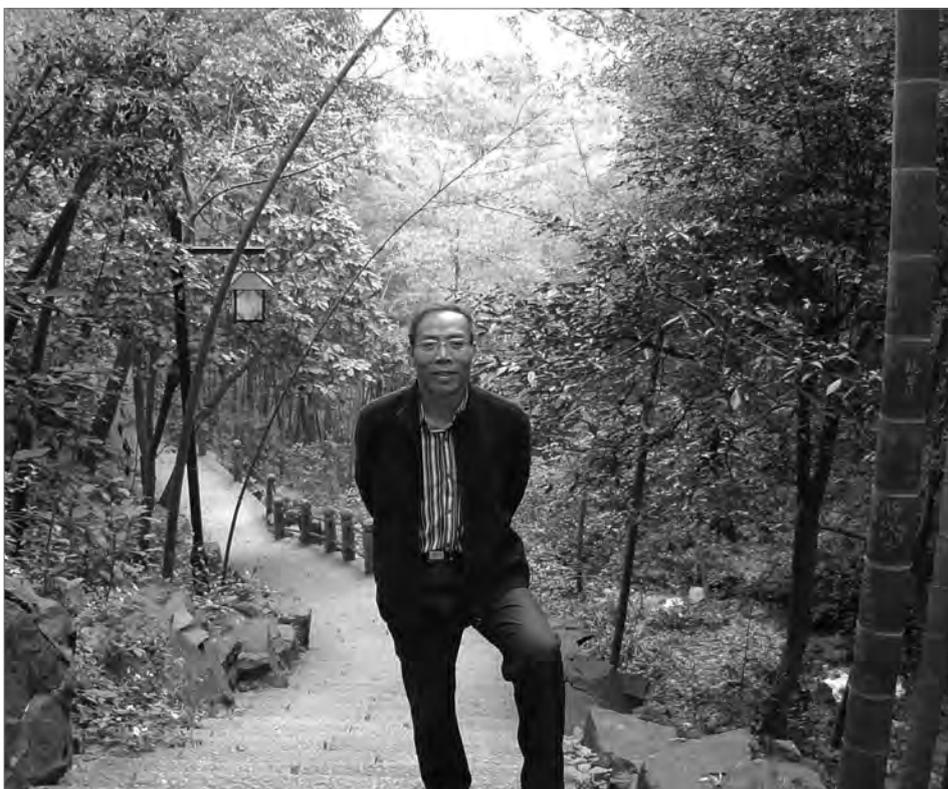
說明：衛××曾為商業戰線「學毛著標兵」，被人們譽為「哲學大餅」。

由於十位成員中有些人已經去世，另外一些人不願意接受採訪，所以我們對他們的個人情況並不完全了解。但上述材料表明，其中有三人出生於工人家庭，四人出生於貧下中農家庭。從個人成份看，六人是大學生，四人是城市企業職工。從政治面貌看，二人為中共預備黨員，六人為共青團員，二人為「群眾」。如果按照「社會衝突理論」的概念劃分，他們都是1949年以後中國現行體制的「受益者」，這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該團體的思想感情和政治態度。

陳秀惠向我們提供了許多有關他個人和「反復辟學會」的歷史資料，並多次接受訪談。他的家庭背景和個人成長道路無疑具有代表性：1945年出生於上海市一個貧民家庭，父親和十個兄弟姐妹在「舊社會」死於飢餓和疾病，留下目不識丁、無固定職業的母親帶着兩個孩子艱難度日。1949年中共建政後，他的母親獲得了穩定工作，家庭生活有很大改善。陳秀惠在政府資助下完成小學和中學學業，並在1964年考上復旦國際政治系，成為家族歷史上第一位大學生，這使他覺得「舊社會處處黑暗，新社會處處光明」<sup>⑮</sup>。從高中階段開始，他就自覺地接受中共的各項主張，決心為黨的事業奮鬥終生。1963年中蘇論戰期間，他第一次向黨組織遞交入黨申請書，申明「我對黨的無限信仰，不是一時感情衝動，而是因為我黨是一個堅強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政黨，……與現代修正主義做堅決的不調和的鬥爭」<sup>⑯</sup>。此後他又多次提交入黨申請書，還不斷以實際行動表明自己的政治忠誠。例如在1964年高中畢業前

夕，政府為了緩解中小學應屆畢業生的升學、就業壓力，發出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號召。陳秀惠帶頭在所在中學貼出〈決心書〉，表示「願意當一輩子的農民」，還寫道：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是政治思想戰線上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反映了兩條路線兩個階級的鬥爭，這個鬥爭集中表現在爭奪青年的問題上。這場鬥爭在我們頭腦中的表現就是究竟是革命到底還是革命到頂，怕不怕艱苦鬥爭的磨練。如果這個革命不徹底勝利的話，革命很可能中斷，中國很可能出修正主義，資本主義很可能復辟」<sup>⑭</sup>。進入復旦以後，他的思想認識和政治態度沒有任何改變：他對毛澤東提出的「無產階級接班人」五項條件深信不疑，多次要求學校黨組織批准他退學，打算到工廠、農村接受鍛煉，「走與工農相結合的道路」<sup>⑮</sup>。由於他一貫積極擁護黨的路線、方針、政策，並能夠時時處處起帶頭作用，所以多次被黨組織評為「積極份子」<sup>⑯</sup>。

陳秀惠還經常在訪談中提到，「反復辟學會」中某些成員對毛主席感情很深。從陳秀惠和他提到其他人的情況可以看出，「知恩圖報」的淳樸感情是維繫學會成員的重要紐帶，同時也深刻地影響着他們的世界觀、價值觀及人生觀。作為「新社會」的受益者，「陳秀惠們」很容易接受主流意識形態的灌輸，真心誠意地「聽黨的話，跟黨走」，這與在「新社會」遭受打壓的社會階層或群體（如地主、富農、資本家及其子女）形成一個鮮明對照。與此同時，作為在校大學生，「陳秀惠們」不具有獨立的社會身份，以及由此衍生的社會身份認同和特殊利益訴求，這與其他社會階層或群體（如工人、農民、黨政幹部等）形成一個鮮明對照。只有了解上述情況，我們才能更好地理解和解釋他們在文革期間的所作所為。



陳秀惠是「反復辟學會」的核心人物。（圖片由樊建政提供）

### 三 「反復辟戰鬥小組」：積極響應號召的產物

1966年5月北京大學「聶元梓大字報事件」和南京大學「六·二事件」<sup>②①</sup>發生後，主流媒體對兩個事件的描述和定性在復旦校園內激起強烈反響。一些激進學生在6月中下旬貼出大字報，指責復旦黨委與北大黨委、南大黨委一樣，對抗中央指示，壓制群眾運動，處心積慮地「轉移目標」以自保<sup>②②</sup>。陳秀惠等人就是在上述背景下捲入文革運動的。

6月26日，陳秀惠與三位同班同學聯名給上海市委寫信，指責復旦黨委「是一個修正主義黨」，「根本不可能領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他們還在信中要求市委派工作組，取代校黨委領導復旦的文革運動，同時成立一個群眾性的文革領導小組<sup>②③</sup>。

7月，陳秀惠等人又連續貼出一批大字報，其中較為重要的是題為〈幫幫忙〉的一系列大字報。這些大字報認為各院系政治指導員的大字報不得要領，敦促他們「寫點大是大非的大字報」；指責校黨委及其支持者玩弄「嚇人戰術」以「阻止批評」；主張對復旦黨委暗中操縱群眾運動的做法「再來一個徹底揭露」；抨擊校內各院系黨組織不願「引火燒身」，搞的是「假批判」，打的是「死老虎」；批評復旦的政治學習「問題相當嚴重，脫離實際，以空對空」，如此等等，不一而足<sup>②④</sup>。

7月底至8月初，毛澤東多次就文革發表看法，主張學校的運動「要由革命師生自己搞革命」<sup>②⑤</sup>，還致信清華大學附屬中學紅衛兵，對他們的「革命主張」表示支持。此後全國各地的紅衛兵組織如雨後春筍般湧現。在此背景下，陳秀惠等人於8月初成立「反復辟戰鬥小組」。8月5日，他們以「反復辟戰鬥小組」名義發表〈致黨委的第二封公開信——文化革命的一切權力必須歸於文化革命委員〉<sup>②⑥</sup>。

8月11日早上，有人在校園內貼出大字報〈堅決罷掉復旦黨委的官〉，陳秀惠等人隨即向中央發出電報，聲稱「復旦時局劇變，黨委保皇面貌徹底暴露」<sup>②⑦</sup>。15日，陳秀惠貼出〈致同濟大學革命戰友的公開信〉，呼籲同濟師生揭批該校黨委負責人常溪萍<sup>②⑧</sup>。25日，陳秀惠參加復旦、同濟等校造反派學生赴上海戲劇學院串聯的「八·二五」事件，並在群眾大會上發表演講。在上海市委負責人對「八·二五」串聯事件作出「既有人民內部矛盾，又有敵我矛盾」的定性後<sup>②⑨</sup>，陳秀惠等人於30日貼出題為〈強烈抗議〉的大字報，聲言：「民不畏死，還怕區區阻力?!」<sup>③①</sup>

9月至10月初，陳秀惠等人赴外地串聯，在北京參加了毛澤東接見紅衛兵的活動<sup>③②</sup>。返滬以後，「反復辟戰鬥小組」的政治立場更加激進，在10月中即捲入轟動一時的復旦造反派學生搶「黑材料」風波，10月底參與組建復旦「三司」，11月中下旬多次寫大字報向復旦各級黨組織負責人「猛烈開火」，12月初加入所謂「打楊戰役」，批判復旦黨委和市委領導楊西光<sup>③③</sup>。

陳秀惠等人的上述激進表現無疑對復旦文革運動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然而他們捲入運動的動因卻耐人尋味。現有的相關研究顯示，儘管表面看來北大、南大、復旦的文革群眾運動都是在中央發出〈五·一六通知〉後一哄而起，但實際上各校政治衝突的起源和性質卻不盡相同。北大大字報事件

與中央高層政爭緊密相關，同時也與「四清運動」造成的校內政治裂痕有關<sup>⑳</sup>；南大「六·二事件」與北京高層政爭無關，但校方與部分師生在創辦溧陽分校問題上確實存在分歧<sup>㉑</sup>；而復旦黨委和激進學生最初的政治衝突，則主要源自文革本身。在中央發出〈五·一六通知〉後，復旦黨委迅速做出動員和部署，將鬥爭矛頭指向「反動學術權威」和黨內「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固然帶有自我保護的現實考量，但同時也包含他們對「文化大革命」概念的字面理解。然而中央對北大事件和南大事件的定性和處理，以及主流媒體的輿論宣傳，使得多重因素導致的政治衝突被化約為「革命師生」與「反革命黑幫」的鬥爭。一部分復旦激進師生在嚴重失實但力道十足的官方輿論誤導下，將鬥爭矛頭對準校黨委，這樣一來政治上步步緊跟中央的復旦黨委領導人，和同樣步步緊跟中央的少數激進學生，分裂為兩股相互對抗的政治勢力。正正由於兩者之間不存在任何先天的緊張關係和實質的利害衝突，因此儘管激進學生批判校黨委的大字報標題聳人聽聞、政治調門很高，但其內容卻十分空洞。質言之，在最初階段，他們批判校黨委的行動不過是積極響應號召。

#### 四 「一·二八炮打」事件：「政治模糊性」引發政治衝突

所謂「政治模糊性」，是美國學者魏昂德(Andrew G. Walder)在研究文革期間群眾派性衝突時最先提出的一個理論概念<sup>㉒</sup>，是指在當時的國家政治運作中，存在着兩套政治規則和話語體系：一是「顯規則」和與之相伴的話語體系，主要體現在公開發布的官方文件和輿論宣傳中；二是「潛規則」和與之相伴的話語體系，主要體現在各種現實問題的應對處置中。兩套政治規則和話語體系並存並行，一方面為當局操控國家政治、貫徹領導人意圖提供了極大的便利，另一方面使得許多事情的定性和處理帶有極大的不確定性。

「政治模糊性」必然引發思想混亂和意見分歧：人們按照一般常識和經驗理性所做出的抉擇，以及按照最高當局的公開號召所採取的行動，往往會因「潛規則」的存在而事與願違。從這個意義上講，文革期間的群眾政治參與其實是一場賭博遊戲。因而具有相似社會背景和政治傾向的人們，在運動發展過程中往往會分裂成相互敵視的政治派別。前述陳秀惠等人與復旦黨委的矛盾衝突，以及下文將要敘述的陳秀惠等人與張春橋的矛盾衝突，都是「政治模糊性」的產物。

陳秀惠等人與張春橋的政治衝突發生在1967年初。關於這一時期上海文革的一般情況，國內外學界已有較為全面深入的敘述與分析<sup>㉓</sup>。這裏需要着重指出的是，原先在上海市委書記處排名靠後的張春橋之所以在「一月風暴」期間成為上海市最高領導人，首要因素是他熟諳並遵從政治「潛規則」，因而獲得中共中央高層的信任和支持；山東王效禹、山西劉格平、黑龍江潘復生、貴州李再含的情況與張春橋大同小異<sup>㉔</sup>。由此可見，各地「奪權」行動都受到中央高層的暗中操控，「奪權」行動的實質是中央集權官僚政體下地方代理人的變更，這顯然與官方輿論宣傳大肆渲染的「一切權力歸革命造反派」<sup>㉕</sup>的口號相互抵牾。不過，作為國家政治「紙牌屋」(House of Cards)的局外人，

「陳秀惠們」顯然對現實政治中的「潛規則」一無所知，始終遵照「顯規則」來判斷文革運動的走勢，並不斷採取自認為正確的「革命行動」。

具體說來，導致「反復辟戰鬥小組」捲入「一·二八炮打」事件的因素主要有兩個：

第一，他們認為張春橋對群眾組織的「奪權」行動態度消極，違背了中央的號召，這個看法主要源於當時的官方輿論。事實上，在向省市級地方黨委「奪權」的問題上，毛澤東自有其不便明言的隱憂和顧忌，所以在1967年1月16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談到各級黨政機構權力更迭問題時，沒有採用「奪權」一詞，而是用了「接管」一詞：「接管很好，只管政務，不管業務，事情還是原來的人去搞，我們只管監督。」<sup>⑳</sup>因此，儘管《人民日報》於1月22日發表造反派文章〈一切權力歸革命造反派〉和〈造反就是要奪權〉，並配發社論〈無產階級革命派大聯合，奪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權！〉<sup>㉑</sup>，表面上積極支持造反派向地方黨政機構「奪權」，但實際上中央高層十分重視對「奪權」過程的管控。就在同日下午，周恩來在接見外地來京群眾時宣布了「奪權」的三條原則：必須實行各革命群眾組織的大聯合，有計劃地、有組織地進行，要反對分散主義、各自為政；各單位的接管必須以本單位的革命組織為主；原來的業務機構和人員中能夠工作的，都要照常執行任務，外邊的革命群眾組織起幫助和監督作用<sup>㉒</sup>。

基於上述背景，當時以中央文革小組調查員身份派駐上海的張春橋、姚文元，對1月中下旬造反派群眾組織的幾次「奪權」行動均未表態支持。顯而易見，1月16日前他們不支持群眾組織的「奪權」行動，主要是因為毛澤東尚未做出決斷，而22日以後依然不支持群眾組織的「奪權」行動，主要是因為它們違背了中央提出的三條原則。然而，造反派對中共政治的內部運作缺乏了解，主觀地將張春橋的消極反應歸咎於他的個人品德<sup>㉓</sup>，並打算通過「炮打」行動來捍衛毛澤東的「革命路線」。

第二，他們認為張春橋在蔡祖泉問題上欺騙毛主席，公然保護復旦校內的保守派勢力。蔡祖泉是文革前復旦黨委培養的著名「工人專家」、全國「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標兵」，文革初期擔任復旦電光源實驗室主任、復旦黨委委員。基於蔡祖泉的「工人」身份和「標兵」光環，陳秀惠等人曾在1966年6月26日致上海市委的信中提出，成立以其為首的復旦文革領導小組，取代復旦黨委的領導，然而蔡祖泉本人不僅不支持，反倒為復旦黨委評功擺好<sup>㉔</sup>。在隨後幾個月裏，蔡祖泉始終聽命於復旦黨委，在群眾運動的關鍵時刻充當「定音鼓」<sup>㉕</sup>；直到12月初復旦造反派師生發動所謂「打楊戰役」，他才正式宣布造反，但在宣布造反的第二天，又親蒞上海市保守派組織「赤衛隊」成立大會，致辭祝賀並應邀擔任總部顧問<sup>㉖</sup>。蔡祖泉的政治搖擺引發陳秀惠等人的反感。1967年1月9日，「反復辟戰鬥小組」領頭貼出「蔡祖泉是王零的寵兒」、「不許蔡祖泉招搖撞騙」等巨幅標語<sup>㉗</sup>。10日，又貼出大字報〈復旦大學必須第二次大亂〉，指責蔡是「假標兵」、「假造反」<sup>㉘</sup>。

但毛澤東從上海市文革簡報中獲悉蔡祖泉造反的消息後，當即給予高度肯定<sup>㉙</sup>，所以張春橋在1月13日專門就「揪蔡」問題公開表態，不點名批評了

陳秀惠等人<sup>④</sup>。陳秀惠等人認為，毛澤東之所以高度肯定蔡祖泉，是受到張春橋的蒙蔽和誤導<sup>⑤</sup>，當即貼出了大標語「誰在蔡祖泉問題上欺騙毛主席，就砸爛誰的狗頭！」<sup>⑥</sup>16日，他們又貼出大字報〈再論復旦必須第二次大亂〉，說：「蔡祖泉問題，不只是關係到一個人或幾個人的問題，實際上是關係到楊家店的整個體系問題，關係到上海市委的問題，對全國都有影響」，號召「全校革命造反派聯合起來，繼續發揚運動初期『懷疑一切』的無產階級革命造反精神，誓將復旦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sup>⑦</sup>21日，「反復辟戰鬥小組」和其他群眾組織聯合召開「批判蔡祖泉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大會」<sup>⑧</sup>；22日，聯合其他戰鬥小組在復旦園裏刷出大幅標語「在蔡祖泉問題上欺騙毛主席的人絕沒有好下場！」、「打在蔡祖泉的身上，痛在誰的心上？」<sup>⑨</sup>23日晚，再次和其他群眾組織聯合行動，到上海市區刷巨幅標語「堅決反對在目前成立以張春橋、姚文元為首的新市委」、「警惕陶鑄、王任重式的人物」、「張春橋就是張春橋，張春橋不等於中央文革」等<sup>⑩</sup>。在上述大字報、大標語的連番鼓譟下，復旦幾大群眾組織紛紛表態支持「炮打」<sup>⑪</sup>。

1月28日凌晨，部分復旦造反派將一名張春橋親信劫持到復旦，張春橋隨即派全副武裝的軍隊到復旦要人；造反派群情激憤，正面衝突一觸即發<sup>⑫</sup>。中央文革小組聞訊後，於29日向上海發去特急電報，稱造反派反對張春橋、姚文元的言行「是完全錯誤的」<sup>⑬</sup>。「陳秀惠們」無法理解這份電報對「炮打」事件的定性，進而懷疑這份電報的真偽。群情洶湧之下，陳秀惠又貼出大標語「張春橋同志的老虎屁股就是要摸，我們摸定了，一摸到底！」<sup>⑭</sup>

然而，電報的真實性很快得到證實。儘管「反復辟戰鬥小組」和復旦其他激進造反派組織迅速轉變態度，表示對中央文革小組的指示「不理解也要執行」<sup>⑮</sup>，但一場針對它們的「反逆流」運動依然如暴風驟雨般襲來。從1967年2月初至3月底，捲入「炮打」活動的組織和個人慘遭打壓<sup>⑯</sup>。這使「陳秀惠們」倍感痛苦與困惑<sup>⑰</sup>，但他們並沒有由困惑走向反思，再由反思走向覺醒，反而依然對毛澤東無限崇拜，對官方輿論中所宣示的文革目標堅信不疑；始終認為自己在「反逆流」運動中遭受打壓，是由於張春橋背着中央另搞一套。（未完待續）

## 註釋

- ① 王紹光：《理性與瘋狂：文化大革命中的群眾》（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3），頁209-21。
- ② 宋永毅、孫大進：〈總論：異端初露，思潮迭起的中國文化大革命〉，載《文化大革命和它的異端思潮》（香港：田園書屋，1997），頁11-70。
- ③ 徐友漁：〈異端思潮和紅衛兵的思想轉向〉，《二十一世紀》（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1996年10月號，頁53。
- ④⑦ 印紅標：《失蹤者的足跡：文化大革命期間的青年思潮》（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9），頁118、124-31；97。
- ⑤ 包括1966至1968年間該組織（1966年為「反復辟戰鬥小組」）成員撰寫的大字報和文章、1968年以後他們接受審查期間提交的檢查交代材料、1975年以後他們為爭取平反提交的申訴材料，以及1968至1970年間復旦大學官方公布的所謂「罪證材料」和校方組織撰寫的大批判材料等，共計四十餘萬字。

- ⑥ 徐志新是復旦大學國際政治系青年教師，文革前期沒有深度捲入造反運動和派性鬥爭，後來參加「反復辟學會」專案組工作，因不同意將「反復辟學會」定性為「反革命組織」而受到打擊迫害。李元茂是復旦大學國際政治系教師，文革前期沒有過度捲入造反運動和派性鬥爭，後因對該學會定性持有異議遭到打擊迫害。
- ⑦ 〈周恩來對外交部的講話〉(1967年10月18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批轉江西省革籌小組正確對待極「左」派的經驗〉(1967年12月25日)，載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盤(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4)。
- ⑧ 〈行動起來，向反動思潮宣戰〉，《復旦戰報》(復旦大學革命委員會、復旦大學「八·一八」紅衛兵師《復旦戰報》編輯部)，第34期(1968年3月12日)，第1版；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寫作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期間各種反動思潮資料彙編(二稿)》，抄件(1970年1月)，頁75-77，李遜提供。
- ⑨ 劉國凱：〈論人民文革〉，載宋永毅主編：《文化大革命：歷史真相和集體記憶》，上冊(香港：田園書屋，2008)，頁475-96。
- ⑩ 印紅標：〈前言〉，載《失蹤者的足跡》，頁xv-xix。
- ⑪ 我們認為正與異、常與變是相對而言的，是互為坐標與參照的，有所謂異變，就一定有相對的正常。在對文革社會思潮的思想屬性做出判斷的時候，拿典型文本做依據至關重要，但與此同時，還應該指出相應的恰當的參照系。這個參照系可以是社會思潮當事者的整體思想樣態、可以是官方的特定意識形態話語，可以是官方的特定政策，也可以是西方的特定文化傳統或思想。關於這一話題，我們將另文繼續專述。
- ⑫ 例如楊曦光的父親楊第甫受湖南「省無聯」案牽連，他在1991年出版的回憶錄《吹盡狂沙：楊第甫自述》提供了許多關於「省無聯」和楊曦光的重要信息，尤其是楊曦光當年的真實思想狀況(參見唐伯固整理：《吹盡狂沙：楊第甫自述》[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但在2009年出版的《失蹤者的足跡》一書中，作者在論述相關問題時並未引證該書的內容。
- ⑬ 「反復辟學會」：〈「反復辟學會」情況介紹(草案)〉，打字油印件(1967年10月10日)，頁2。
- ⑭ 陳秀惠：〈致蘇振華、倪志福、彭沖同志的信〉，手稿(1976年12月23日)，頁4。
- ⑮ 陳秀惠：〈入黨申請書〉，手稿(1963年10月1日)，頁3。
- ⑯ 陳秀惠：〈我願意當一輩子的農民——決心書〉，手稿(1964年5月3日)，頁1-2。
- ⑰⑱ 陳秀惠：〈關於日記、手冊及其他的說明〉，手稿(1977年6月16日)，頁3；4。
- ⑲ 陳秀惠：〈我的檢查〉，手稿(1970年12月)，頁8。
- ⑳㉑ 董國強：〈從南京大學「倒匡」事件看「文革」的複雜屬性與多重面相〉，《二十一世紀》網絡版，2006年9月號，www.cuhk.edu.hk/ics/21c/media/online/0604048.pdf。
- ㉒ 「過河卒戰鬥小組」：〈概況〉，載「過河卒戰鬥小組」編印：《復旦大學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紀事》，打字油印件(1966年9月8日)，頁1；「心向黨戰鬥小組」編，生物系「赤衛隊」翻印：《復旦大學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大事記》，手刻翻印油印件(1966年11月14日)，頁1-2。
- ㉓ 陳秀惠等：〈致曹荻秋同志的信〉，原件(1966年6月26日)，頁3。
- ㉔ 陳秀惠：〈幫幫忙——建議之一〉(1966年7月3日)、〈幫幫忙——建議之二〉(1966年7月19日)、〈幫幫忙——建議之三〉(1966年7月3日)、〈幫幫忙——建議之四〉(1966年7月18日)、〈幫幫忙——建議之五〉(1966年7月22日)、〈幫幫忙——建議之六〉(1966年7月31日)、〈幫幫忙——建議之七〉(1966年8月6日)，均為底稿原件。
- ㉕ 中央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五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頁601-603。
- ㉖ 「反復辟戰鬥小組」：〈致黨委的第二封公開信——文化革命的一切權力必須歸於文化革命委員〉，底稿原件(1966年8月5日)。

- ⑳ 陳秀惠等十人：〈電報〉，底稿原件（1966年8月11日）。
- ㉑ 陳秀惠：〈致同濟大學革命戰友的公開信〉，手稿（1966年8月15日）。
- ㉒ 〈曹荻秋講話〉（1966年8月26日晚），載新師大文革籌委會物理系「五敢」聯絡部、化學系「挺進」兵團聯合編印，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第三司令部翻印：《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曹荻秋言論集》（1966年12月），頁22-24。
- ㉓ 國際政治系二年級「反復辟」：〈強烈抗議〉，手稿（1966年8月30日），無頁碼。
- ㉔ 樊建政、董國強：〈文革初期復旦大學的「黑材料」風潮〉，《二十一世紀》，2016年6月號，頁29-45。
- ㉕ 印紅標：〈文革的「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二十一世紀》，1996年8月號，頁37-45。
- ㉖ Andrew G. Walder, "Ambiguity and Choice in Political Movements: The Origins of Beijing Red Guard Factionalism",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12, no. 3 (2006): 710-50.
- ㉗ Andrew G. Walder, *Chang Ch'un-ch'iao and Shanghai's January Revolution* (Ann Arbor, MI: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y of Michigan, 1978); Elizabeth J. Perry and Li Xun, *Proletarian Power: Shanghai i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1997); 李遜：《革命造反年代：上海文革運動史稿》（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15）。
- ㉘ 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頁186-91。
- ㉙ 〈一切權力歸革命造反派〉，《人民日報》，1967年1月22日，第4版。
- ㉚ 〈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的講話記錄〉（1967年1月16日）。轉引自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下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頁1468。
- ㉛ 〈一切權力歸革命造反派〉、〈造反就是要奪權〉；〈無產階級革命派大聯合，奪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權！〉，《人民日報》，1967年1月22日，第4版、第1版。
- ㉜ 〈周恩來陳伯達在外地來京群眾有線廣播大會上的講話〉（1967年1月22日），載《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 ㉝ 吳中杰：《復旦往事》（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頁178；安文江：〈我不懺悔〉，載周明主編：《歷史在這裏沉思——1966-1976年紀實》，第五卷（太原：北嶽文藝出版社，1989），頁311；「反復辟戰鬥小組」（反復辟戰鬥小組是「紅三司」下屬的小戰鬥組）：〈關於炮打的檢查〉，手稿（1967年3月1日），頁2，陳秀惠提供；上海「文革」史料整理編纂小組：《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話》，未刊稿（1992年），頁267。復旦激進小組「孫悟空戰鬥小組」成員認為，張春橋在處理「上三司」奪權問題時，用的是政客作風，耍的是兩面派手腕。「紅三司」頭頭安文江事後回憶說，張春橋在造反派向市公安局「奪權」問題上態度反覆，既「造成了造反派內部的公開對立，又暴露了他以我劃線的偏窄心理，文過飾非的詭詐嘴臉，這是促成我們日後炮打張春橋的原因之一」。「紅革會」總部成員認為，張春橋的許多做法不符合毛澤東思想。「反復辟戰鬥小組」成員的看法與上面提到的看法一致，他們認為張春橋的消極干預，使上海和復旦的文革運動存在「不深入，要走過場」的危險。「上三司」、「紅三司」、「紅革會」的簡要情況，可參見樊建政、董國強：〈文革初期復旦大學的「黑材料」風潮〉，頁29-45。
- ㉞ 陳秀惠：〈關於日記、工作手冊及其他的說明〉，頁4；陳秀惠訪談，福州，2012年8月14日；「反復辟戰鬥小組」：〈復旦大學必須第二次大亂〉，載「史紅」戰鬥組編印：《復旦大學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大字報選》，第三輯，油印件（1968年4月），頁31。
- ㉟ 蔡祖泉：〈十二月二日蔡師傅在造反派的大會上發言〉、〈十二月三日，在「聲討反革命修正主義份子楊西光罪行大會」上的發言〉、〈蔡祖泉在復旦大學革命造反派十二月五日召開的「打倒楊西光，砸爛楊家店」大會上的講話〉，載紅衛兵復旦大學革命委員會編印：《巨大的鼓舞，有力的支持——全國活學活用毛主席標兵蔡祖泉同志奮起揭發復旦保皇黨委執行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油印件（1966年12月5日），無頁碼。

- ④④ 〈熱烈歡呼上海工人的大喜事「捍衛毛澤東思想工人赤衛隊」上海總部成立〉，《革命戰鬥快報》（捍衛毛澤東思想工人赤衛隊上海總部），第2期（1966年12月9日），第1版。
- ④⑤ 〈「內戰」紀事〉，《新復旦》（紅衛兵復旦大學革命委員會《新復旦》編輯室），第3期（1967年1月25日），第4版。王零（1918-2010），安徽潛山人，1939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49年後長期擔任復旦黨委領導班子成員，1965年10月起任復旦代理書記。
- ④⑥ 「反復辟戰鬥小組」：〈復旦大學必須第二次大亂〉，頁28-31。
- ④⑦ 上海掃雷縱隊：《復旦妖猴的〈二十問〉矛頭指向哪裏？——反問復旦「孫悟空」》，鉛印件（1967年2月2日），頁1；朱永嘉口述，金光耀、鄧傑整理：《已申春秋——我對文革初期兩段史實的回憶》（香港：大風出版社，2014），頁230。
- ④⑧ 〈張春橋同志、姚文元同志在公安局革命造反委員會邀請部分革命造反團體參加的座談會上的講話紀要（根據記錄整理，未經本人審閱）〉，打字油印件（1967年1月13日），頁5。
- ④⑨ 遵義聯合戰鬥隊「中流擊水」戰鬥隊：《八問反復辟》，油印件（1967年3月8日），無頁碼。
- ④⑩ 新復旦紅革會造反聯絡站聯合調查組：《紅革會混蛋頭頭炮打中央文革罪行錄》，打字油印件（1967年2月19日），頁1。
- ④⑪ 「反復辟戰鬥小組」：〈再論復旦必須第二次大亂〉，鉛印件（1967年1月16日），頁1-4。
- ④⑫ 「東方紅公社」、「反復辟戰鬥小組」、「只爭朝夕戰鬥小組」：〈蔡祖泉是甚麼人？〉（1967年1月21日），載《復旦大學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大字報選》，第三輯，頁50。
- ④⑬ 上海市委機關革命造反聯絡站：《以紅革會某些負責人為代表的炮打中央文革的反動逆流紀要（未定稿，供討論參考用）》，鉛印件（1967年3月），頁5。
- ④⑭ 陳秀惠：〈關於炮打的檢查〉，手稿（1967年2月29日），頁8；新復旦紅革會造反聯絡站聯合調查組：《紅革會混蛋頭頭炮打中央文革罪行錄》，頁3；陳秀惠：〈控訴材料之一〉，手稿（1977年5月9日），頁3-4。
- ④⑮ 周信東：〈請罪與交代〉，油印件（1967年2月21日），頁1。周信東時為復旦中文系青年教師、復旦「紅革會」勤務組成員。另見陳秀惠：〈關於炮打的檢查〉，頁9；上海市委機關革命造反聯絡站：《以紅革會某些負責人為代表的炮打中央文革的反動逆流紀要》，頁8。
- ④⑯ 周信東：〈請罪與交代〉，頁4；陳秀惠：〈關於炮打的檢查〉，頁16；上海市委機關革命造反聯絡站：《以紅革會某些負責人為代表的炮打中央文革的反動逆流紀要》，頁11-13。
- ④⑰ 中央文化革命小組：〈中央文革特急電報〉，鉛印件（1967年1月29日），無頁碼。
- ④⑱ 紅衛兵復旦大學第三司令部：〈紅衛兵復旦大學第三司令部聲明〉（1967年1月31日）、〈再次聲明〉（1967年2月1日），載《復旦大學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大字報選》，第三輯，頁65；陳秀惠：〈關於炮打的檢查〉，頁19。
- ④⑲ 陳秀惠：〈關於炮打的檢查〉，頁18。
- ④⑳ 《袁偉生日記》，原件（1967年1月30日至4月21日），無頁碼；安文江：〈我不懺悔〉，頁315；卞權：〈池東明炮打張春橋〉，《炎黃春秋》，2011年第1期，頁56-59；上海「文革」史料整理編纂小組：《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話》，頁284。
- ㉑ 陳秀惠訪談，上海，2016年7月12日；浦興祖對本文初稿的批註，上海，2017年7月21日。

董國強 上海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

樊建政 上海華東師範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講師